

序 言

2018年，為擴大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的學術影響力，並向中文學界介紹國際漢學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們推出了《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的首期增刊《漢學英華》。彼時定題「漢學英華」，飽含對饒公的懇摯懷想，意謂「采擷英華，輯為是集，兼作追緬之一瓣心香」。饒公通達的治學理念是引領我們的明燈，國學院力求為東西文化交流搭建橋樑，院刊相容並包、中西兼重的原則，亦是承此一脈。如今時隔四年，第二輯《漢學英華》終於要和大家見面，我們的緬想與懷念只有更加深重，同時也欣喜這英華馨香可以悠遠綿長，縷縷不盡。

本輯集結翻譯了院刊第四至七期的英文論文及書評，這些文章分別來自12位作者，既有學養精深的中堅學者，也有鋒芒新露的青年學人。

其中論文十篇，涉及領域涵蓋文學、歷史、語言學、文獻學、文字學、思想史、哲學、社會文化研究等等，材料則從殷商兩周的甲金竹書到兩宋金元的書信筆記，包羅萬有。基於學界當前的豐厚研究成果，這些論文或深鑽精研，或以開闊視野關照社會，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介紹新材料、應用新方法、提供新觀點的工作，拓寬了相關課題的研討範圍。國學院院刊始終提倡開放、包容、創新的學術傳統與風格，期待本文集可以為一窗口，助益讀者獲知近年來國際漢學研究之熱點與潮流。

史亞當的〈花園莊東地 H3 坑甲骨的閱讀方法〉和〈象數之間：離卦在早期《易經》的多重意涵〉關注早期文獻生成過程。前者以花東 H3 坑甲骨為語料庫，細緻分析刻辭行款，發掘史官和貞人在整製甲骨、書寫刻辭等工作中的專家性；後者剖析《易》類文獻的意象生發方式，驗證以出土材料上的數字卦和清華簡《筮法》，揭示卦畫字形與闡釋意象之間的關聯。顧永光的〈試論「民」字在西周思想體系中的政治意涵〉和〈論西周編鐘銘文的文學性質〉充分

利用西周銅器銘文，前者針對西周文獻中的重要概念「民」闡發新思，指出其屬於構成理想政治秩序體系的象徵符號之一；後者以西周晚期的虢季編鐘銘文為案例，結合物質文化研究，在文學性層面，探討鐘銘的押韻、格律等音韻模式是否對於文本表義有可識別的結構功能。麥笛〈格式化的意義：對清華簡《湯在啻門》的深描及其對中國早期思想生產的啟示〉嘗試解釋〈湯在啻門〉內容和文本結構之間的參差。論文引入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藉助信息論概念，將文本放置於立體環境，提出戰國時期的社群施行以格式化文本闡明意義的策略。費安德〈論戰國晚期背景下北大竹書《周訓》與《呂氏春秋》之關係〉以扎實細緻的文本分析比對，局部釐清了《呂氏春秋》的成書過程和編撰原則，並結合歷史背景，指明《周訓》應創作於秦國。許思萊〈「白一沙」上古漢語音構擬的若干問題〉專門討論「白一沙」上古音構擬系統，對其整體框架和具體擬音操作均提出諸多反思，既有方法論層面的宏觀考量，亦包括針對細節問題的檢視。伍伯常〈文化互動與較量——以宋朝（960—1279）和南唐（937—965）為例〉是在歷史研究中有效利用筆記材料的實踐，筆記軼聞雖存在結構性問題，但社會文化研究領域不應忽視其史料價值，通過綜合運用正史、雜史、文集、筆記，可以察知地域文化如何在競爭互動中自我形塑。朱銘堅〈十三世紀華北地區的本地精英網絡與蒙古帝國的管治〉以漢族士人書信集《中州啟筭》為基礎材料，抓取關鍵人物還原交遊網絡，考察金元過渡時期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動向。蔡亮〈我們有多愛自己的父母——對由愛至孝的再思考〉以生命進程為討論框架，深入剖析文本，發掘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對親子關係的複雜認識，探索儒家孝道與父母子女親緣之愛的生發關係。

書評則涉及 2015 年至 2019 年出版的五種著作，即艾蘭《湮沒的思想——出土竹簡中的禪讓傳說與理想政制》，來國龍《幽冥之旅：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柯馬丁、麥笛編《中國政治哲學之

始源：〈尚書〉之編纂與思想研究》，田菱《閱讀哲學、創作詩篇：中國中古時期互文模式的意義創造》，內藤丘《藏語、緬甸語和漢語的歷史音韻學》，分別由費安德、方破、夏含夷、朱夢雯、鄭子寧評介。這五部作品中，迄今僅艾蘭《湮沒的思想》一書已出版中譯本，相信通過本文集，讀者更可掌握海外漢學新近的主要研究成果和趨勢。

本文集絕大部分的翻譯工作，循例委託浸大國學院的研究員、博士生完成。譯者根據個人研究的興趣領域選擇文章，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凡遇到問題，即與作者及時聯絡商榷，以修改潤色文句，盡力完善譯稿。通過翻譯，也達成了深層的學術交流，對於譯者而言，非但是樂事，亦是一樁幸事。在此需要特別感謝陳竹荅先生，為使譯稿文字能以準確精緻、順暢優美的面貌呈現於讀者眼前，陳先生嚴格檢視每份稿件，慷慨分享翻譯編校經驗，協助譯者與作者溝通。翻譯工作的順利完成，離不開他審慎精細的態度和豐富的經驗。此外，依然要鄭重感謝 Amway 發展基金和學界同仁多年來對國學院院刊的大力支持，感謝香港中華書局在出版工作中的協作付出。

2023 年將是浸大國學院成立的第十個年頭，本輯文集籌備的尾聲階段，正逢國學院步入十周年的前夕，或許待到這部「承前啟後」的小總結正式出版時，國學院已迎來十年華誕。院刊一直致力成為國學界與漢學界深度溝通的平台，並在多年發展中逐步滋養出了生動蓬勃的東西學術交流脈絡，相信漢學英華系列可促進此繁盛脈絡向華文學界進一步蔓延。

希望本輯《漢學英華》能如首輯一般，為讀者帶去嘗鼎一臠之趣。

僅此為序。

徐鳳儀
2022 年 7 月

目錄

i	徐鳳儀	序言		
	論文			
1	史亞當 (龐琨譯)	花園莊東地 H3 坑甲骨的閱讀方法		
59	史亞當 (高潔譯)	象數之間：離卦在早期《易經》的多重意涵		
105	顧永光 (段陶譯)	論西周編鐘銘文的文學性質		
151	顧永光 (沈燕飛譯)	試論「民」字在西周思想體系中的政治意涵		
187	麥笛 (陳子如譯)	格式化的意義：對清華簡〈湯在啻門〉的深描及其對中國早期思想生產的啟示		
221	費安德 (郭倩夢譯)	論戰國晚期背景下北大竹書《周訓》與《呂氏春秋》之關係		
273	許思萊 (王雪婷譯)	「白一沙」上古漢語語音構擬的若干問題		
303	伍伯常 (蘭倩譯)	文化互動與較量——以宋朝(960–1279)和南唐(937–965)為例		
373	朱銘堅	十三世紀華北地區的本地精英網絡與蒙古帝國的管治		
425	蔡亮	我們有多愛自己的父母——對由愛至孝的再思考		
			書評	
467	費安德 (龐琨譯)			評艾蘭《湮沒的思想——出土竹簡中的禪讓傳說與理想政制》
477	方破 (郭倩夢譯)			評來國龍《幽冥之旅：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
485	夏含夷 (楊起予譯)			評柯馬丁、麥笛編《中國政治哲學之始源：〈尚書〉之編纂與思想研究》
527	朱夢雯			評田菱《閱讀哲學、創作詩篇：中國中古時期互文模式的意義創造》
539	鄭子寧 (王雪婷譯)			評內藤丘《藏語、緬甸語和漢語的歷史音韻學》

Contents

i	XU Fengyi	Preface		
	Articles			
1	Adam Craig SCHWARTZ	How to Read an Oracle Bone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Pit H3		
59	Adam Craig SCHWARTZ	Between Numbers and Images: the Many Meanings of Trigram <i>Li</i> 離 in the Early <i>Yijing</i>		
105	Joern Peter GRUNDMANN	The Question of Literariness in the Composition of Western Zhou Bronze Bell Inscriptions		
151	Joern Peter GRUNDMANN	The Term <i>Min</i> 民 as a Political Concept in Western Zhou Thought		
187	Dirk MEYER	“Patterning Meaning”: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Tsinghua Manuscript “Tāng zài Chi/Dì mén” (Tāng was at the Chi/Dì Gate) and What It Tells Us about Though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		
221	Andrej FE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Zhou xun</i> 周訓 and <i>Lüshi chungiu</i> 呂氏春秋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273	Axel SCHUESSLER	Questions about Baxter & Sagart’s Old Chinese		
303	NG Pak-sheung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Competitions: The Case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Tang		
373	CHU Ming Kin	Indigenous Elite Networks and Mongol Governance in Thir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425	CAI Liang	How Strong is Your Love for Your Parents? Childlike Mindset and the Confucian View of Filial Piety		
			Book Reviews	
			467	Andrej FECH Review of <i>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i> by Sarah Allan
			477	Paul FISCHER Review of <i>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ese Religion</i> by Guolong Lai
			485	Edward L. SHAUGHNESSY Review of <i>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i> edited by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
			527	ZHU Mengwen Review of <i>Reading Philosophy, Writing Poetry: Intertextual Modes of Making Meaning in Early Medieval China</i> by Wendy Swartz
			539	ZHENG Zining Review of <i>The History Phonology of Tibetan, Burmese and Chinese</i> by Nathan W. Hill

花園莊東地 H3 坑甲骨 的閱讀方法

史亞當 (Adam Craig SCHWARTZ)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龐琨譯

本文以 1991 年花園莊東地 H3 坑出土的卜辭記錄為材料，集中探討其商代記事者的工作習慣和動機。這一群史官與另一群貞卜人物同時隸屬於當時某一位高權重的王子，兩個專業群體共同開發出一套作業技術並付諸實踐，以經濟簡便的方式分工合作，連貫且有效地完成他們的工作。這批甲骨刻辭體現出高度的同質性和統一性，反映當時史官已能精準地記錄卜筮內容，而且在專門記錄的設計、書寫和規範呈現等方面，他們也具備獨特的辦事能力和創造力。更重要的是，從刻辭行款可見他們對材料的把握，體現了商代史官的知識水平，並意味著刻寫卜辭實為了日後閱讀和翻查之用。

關鍵詞：商代文字記事 專業工作習慣和動機

甲骨占卜 上古知識水平

緒言

花園莊東地甲骨（下簡稱「花東甲骨」）最早發現於1991年，2003年以六冊對開本全部公布出版，這是一個密集的共時語料庫（synchronically compact corpus），其中包含了晚商時期（約公元前1250–前1045年）的數千條獨立卜辭，它們刻在數以百計的完整龜甲和牛肩胛骨上。¹ 這些甲骨卜辭屬於第27代商王武丁在位時的某位王子，它們無疑是中國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契刻發現之一。而且，這組出土材料在甲骨學研究方面，尤其是在決策斷疑以及記錄歸檔方面，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統計學方法導向的語料庫。早期中國領域的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仰賴於更多完整甲骨的發現，以揭示貞卜人物和史官共同製作這些物質文獻的操作方法和專業技術。花東甲骨是一個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6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後文用HYZ（花園莊）這個縮寫來代指這批甲骨。如HYZ181.5指第181片，第5條。坑中共發現689片卜骨，絕大多數是龜腹甲（659）；剩下的是龜背甲（25）和牛肩胛骨（5）。經過綴合，2003年的正式出版物中包括了561片甲骨的彩色照片、剖面放大圖以及刻辭的拓片和摹本。在去除重複、進一步綴合以及減去背面刻辭的數量（30）之後，卜骨的總數為529，包括511片龜腹甲、13片龜背甲和5片牛肩胛骨。關於本文引用的花東甲骨的討論和其他信息，參A.C. Schwartz,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9)。

展現商代貞卜人物和書記官之習慣與動機的理想語料庫。²

關於古代社會的知識水平，一個相當有趣的話題是，商代甲骨史官的自主權到底有多大（甚或是否存在），這也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充分研究的一個問題。本文將甲骨刻辭視作物質文獻，著重探討其筆畫和行款，以圖證明製作H3坑甲骨刻辭的史官實際上遠不止是記錄口述的熟練刻工，也不是只會機械地複製給定的材料。³

史官與貞卜人物合作，在529塊龜甲牛骨上留下了2452條卜辭，他們所採用的技術不僅證明了準確的甲骨占卜的專業性，對於我所要討論的問題來說，也許更重要的

2 Keightley（吉德煒）曾說：「儘管已懸隔三千餘載，商代晚期（約公元前1250–前1045年）的甲骨刻辭有時會直接讓我們感受到，商代貞卜人物和書記官有非常傑出的工作習慣和動機。」David N. Keightley, “Theolog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uth and the Ancestors in the Wu Ding Divination Records,” in *These Bones Shall Rise Again: Selected Writings on Early China*, ed. Henry Rosemont J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207.

3 張桂光的研究使我獲益匪淺。參張桂光：〈花園莊東地卜甲刻辭行款略說〉，王建生、朱岐祥：《花園莊東地甲骨論叢》（臺北：聖環圖書，2006年），頁65–67。本文亦曾參考下列三種文獻。劉源：〈試論殷墟花園莊東地卜辭的行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頁112–116。章秀霞：〈花東卜辭行款走向與卜兆組合式的整理和研究〉，收入王宇信等主編：《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中國福山）》（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74–192。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34–98。

是，這證明了表演性的口語是如何一步步通過設計和排布而形成書面記錄，再記載到燒灼過的骨頭上的。與在安陽為商王工作的史官類似，花東的史官也採用了一些經濟簡便的方法來具體調度工作量，並在保持形式和設計的美感的同時，連貫而高效地完成他們的工作。⁴我認為，史官對花東甲骨卜辭所進行的排布和書寫，其目的就是用於閱讀和查閱。

4 在花東刻辭中，最好的一個例子或許是，這群史官記錄卜骨的兆豐用辭及其兆側命辭時，所使用的短語是「用」和「不用」，而不是「茲用」和「茲不用」。指示代詞「茲」指的是一個特定的兆豐，亦即骨面上與「茲」距離最近的一個，故而「茲用」的意思就是「用這個（兆豐）」。「用」則是「茲用」的簡寫。史官大概無需寫明「茲卜用」，因為「兆豐」本身已經昭然於骨面，也可以視作一個字，所以不必特綴「卜」字。（「卜」字本就象骨面兆豐之形。）「用」比「茲卜用」更加簡潔、連貫、高效，也是一種風格創新。甲骨卜辭如果是寫在易朽壞的材料上，那麼這種縮寫就不會清晰可辨了。圖 1 說明了史官如何圍繞兆豐設計各種「用」的布局。關於商代甲骨文中「茲用」的研究，首創於胡厚宣：〈釋茲用茲御〉，收入宋鎮豪、段志洪等：《甲骨文獻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18 冊，頁 1-5。關於「用」與「不用」如何判斷，參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 卷甲骨文卷，頁 321-322；以及〈釋「厄」〉，同上，頁 457。又參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頁 198。倪德衛也曾說，「它（茲用）是用來解讀兆豐的。」參 David N. Keightley, *Working for His Majesty*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2), 366.

花東甲骨刻辭的統一性和可解讀性使其成為一個理想的數據庫，可以用來研究非王卜辭的某些貞卜人物和史官集團的占卜實踐及其機制。本研究回顧了文獻表達的風格和習慣，並提出如何將這些標準作為方法和手段來補充正字法分析，以推斷史官的身分，並判斷安陽史官傳統中的知識水平。⁵我的重點是通過研究各種行款（即文本的排布與朝向）和文檔或稱「頁面」的設計風格，來完善閱讀花園莊東地甲骨文的方法。書寫方向及其相關習慣是花東甲骨書寫的一個整體的主位（emic）特徵，對這些內容的研究闡明了一些細節，從而揭示了專業史官怎樣展示他們的專業知識，以及他們如何設計文本的閱讀效果。⁶

5 顯微正字分析法現在是甲骨學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崎川隆將賓組甲文類型分為 14 組，崎川隆：《賓組甲文分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周忠兵發現了與歷組貞卜人物集團相關聯的新的史官，周忠兵：〈談新劃分出的歷組小類〉，《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22-229。更為明顯的是，學者們嚴重低估了安陽及其他區域與貞卜人物合作的史官的數量。

6 本文標題中的「閱讀（read）」一詞就有這個含義。它並不是要介紹或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解釋如何破譯和理解這些刻辭的語言和文字，我最近已經在其他文章中進行了相關研究（Schwartz,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Huayuanzhuang East*）。

卜辭的書寫流程尚不明確。一種假想是，甲骨刻辭騰寫自貞卜人物的筆記。⁷該假想認為，負責在甲骨表面契刻內容的是刻工，他們只是機械地複製給定的材料。另一種假想提出，在實際的占卜過程中，有史官在場，他們或憑藉記憶，或在貞卜人物（們）的幫助之下，於之後的某個時間將原始的口頭表述轉寫為書面記錄。⁸當然，有些貞卜人物也完全有可能自行記錄，但貞卜人物和史官是兩個不同的職業群體，這一情況已有明證，因此我還是要將兩者區分開來，儘管他們之間也存在交叉。⁹

7 吉德煒曾介紹過「貞卜人物筆記」這一概念。參 David N. Keightley, "The Diviners' Notebooks: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s,"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Discovery*, ed. Yau Shun-chiu and Chrystelle Maréchal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1), 11–25.

8 張世超：《殷墟甲骨字跡研究——自組卜辭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9 胡厚宣：〈卜辭記事文字史官簽名例〉，《甲骨文獻集成》，第18冊，頁29–33。他首先指出了出現在甲骨的頂端、底端以及側邊單獨的名字，它們與卜辭不相連屬，胡氏稱之為簽名，並認為這些是在甲骨上契刻卜辭的史官的名字。胡氏指出，這些名字如殼、爭、亘等，與武丁的貞卜人物名字相同。饒宗頤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商代青銅器上的史官被稱做「師X」，甲骨刻辭中有時也會在貞卜人物的名字之前冠以其身分「卜」，但從沒有將類似的這些名字稱作「史」的先例。參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年），頁22–23、27–29。（饒宗頤舉出了兩個以「大（太）史」冠名的例子，但這兩例都不見於已知的商代貞卜

如果沒有「貞卜人物筆記」，就無法了解占卜活動的記錄，也無法了解史官是如何知曉每條兆豐的含義。然而，省略句式和卜辭行款這兩個跡象表明，寫在甲骨上的最終記錄可能經過了編輯和重組。¹⁰這組新發現的甲骨文獻有力地表明，史官在書寫卜辭時，會有意識地調節和規整記錄的長度，以取得行文對稱和字數的平衡。他們還可以按照語法成分（短語、分句、句子）和形式單位（敘辭、命辭、占辭、驗辭）來解析占卜記錄。這些甲骨刻辭記錄方法表明了記錄者的專業性，展現了他們的知識水平，更關鍵的是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材料的把握。

人物。）饒宗頤（同上，頁29）提出了一個理論，即貞卜人物與史官不能一一對應，只不過兩者之間有所疊合。他這一說法的切入點是，有時單片腹甲上的卜辭書風統一，但卻記錄了多個貞卜人物的名字。此類例子證明，並非所有的貞卜人物都是史官。儘管貞卜人物和史官的身分有時會有疊合，比如，在侯家莊發現的一組龜腹甲刻辭中，貞卜人物的名字常常又出現在正面的底端，但目前比較保守的看法還是將貞卜人物與史官分而視之。見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甲骨文獻集成》，第6冊，頁105–123。花東卜辭中有一條卜辭比較特殊，記錄了一位音樂師（瞽）作出的占卜：「辛亥瞽卜：家其句又（有）妾又（有）畀」。其大意为，如果家（舞者的名字）索求妾，那麼他就會得到一些妾（HYZ490.11）。在花東卜辭中，這位音樂師的工作應該是演奏音樂，他有可能在骨面進行鑽鑿，也有可能對占卜做出解讀，但很難想像是他本人把卜辭刻在甲骨上。

10 自商代甲骨卜辭以降，省略法就成為了中國古典文獻的一個重要特徵和修辭手段。參饒宗頤譯：《近東開關史詩》（臺北：新文豐，1991年），前言頁1。